

引　言

历史是一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悲剧与喜剧交相演出。人们常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描绘中国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错的。换一种说法，治久必乱，乱久必治，似乎更能揭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奥秘。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周期性震荡和农民起义，以及在此之后出现的大治和社会稳定局面，就是这种治乱悲喜剧交相演出的生动画面。相比而言，虽然乱世的影响力持久深远，但从时间上看，治世比乱世却更为长久。中国历史之所以源远流长，中华文明之所以光辉灿烂，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在长期稳定局面下所创造和辛勤劳动的结果。因此，研究和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治世，无疑将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与康乾盛世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三个时期分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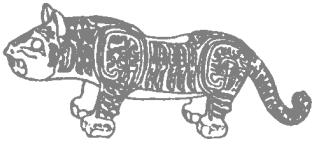
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早、中、晚期,具有典型意义。

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相比,康乾盛世无论在时间、规模、影响诸方面都远远地超过前二者。然而，人们对康乾盛世的了解和研究则远不如对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那样深入。清初民族斗争的剧烈以及频频发生的文字狱等，影响了人们对康乾盛世的客观评价。

康乾盛世并不是指从康熙帝玄烨继位（1661)到乾隆帝弘历退位(1795)长达 130 余年的历史。康熙幼龄登基，权在四大臣，只是在康熙八年擒除鳌拜后，才有所作为，因而康乾盛世的起点应当在康熙八年（1669）。乾隆后期，由于和珅当权，朝政腐败，盛世已走上末途，所以康乾盛世终结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爆发的王伦领导的白莲教起义。这样算来，康乾盛世所持续的时间大约是 105 年。

康乾盛世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共同努力的结果。玄烨在位 61 年,弘历在位 60 年，在位时间之长是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难以比拟的，加之他们文武全才，克尽王道，其影响力持久而深远，几乎妇孺皆知。而对雍正皇帝胤禛，人们却知之较少。原因之一，是其在位时间较短，仅 13 年；原因之二，是其继位与死亡的扑朔迷离的传说，使史家对之望而生畏，所以把他的名字略去，而只提及康、乾两位皇帝，似乎盛世的出现与他无关。应该说，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胤禛在位时间不长，但他主持朝政的这 13 年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胤禛的励精图治,不仅其父玄烨初步奠定的国基非但不能保持，连乾隆盛世的出现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胤禛是康乾盛世出现的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康乾盛世更确切的提法,应当是‘康雍乾盛世”。

“盛世”是指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局面，是相对于“衰世”、“乱世”、“末世”而言。因而，所有的盛世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并非指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实际上,在每个“盛世”的背后,都隐藏着黑暗、末世的东西,康乾盛世也不例外。本书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康、雍、乾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作客观的介绍和评价。



第一章　内抚外拓　初奠国基

康熙，名玄烨，顺治皇帝福临第三子。顺治十六年（1661），福临因染天花而死，年仅 8 岁的康熙在其祖母博尔济吉特氏的拥戴下，登上帝位，开始了他漫长的帝王生涯。登极不久，祖母问他有何愿望，康熙回答："愿天下太平，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可见其志向远大，决心做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第一节　少年天子　初显锋芒

康熙八年（1669）五月，一位内大臣托病不朝，竟提出要皇帝去他家看望，康熙坦然允诺。当康熙走进大臣的卧室时，这位大臣却突然神色紧张，不知所措。御前侍卫和托为防意外，急奔大臣床前，揭开席子，露出一柄白光闪闪的利刃。侍卫正要呵斥，康熙却若无其事地笑道："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不

足异也”

这位内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四位内大臣之一——鳌拜。

是侍卫多疑，还是鳌拜图谋不轨？我们现在不敢贸然下结论，但根据当时的背景分析，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存在。遵顺治皇帝遗嘱，在康熙继位的头几年，朝廷政务主要由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辅臣主持。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负责教养小皇帝，也参与重大政务决策。四大臣中，索尼为四朝元勋，功劳卓著，位居四人之首，总掌启奏批红大权，但此时他已年老力衰。其次是苏克萨哈，他虽富于财力，却因爵位较低，加之他本是多尔衮所领有的正白旗人，显得势单力孤。遏必隆处事小心谨慎，唯唯诺诺，从不妄言生事。四人中最有权力欲望的是鳌拜，他居功傲横，培植私党，排陷异己，飞扬跋扈，时刻想取代索尼首臣地位，以专朝政。

康熙六年(1667)，康熙 14 岁，辅政大臣索尼等上疏，请康熙照其父皇 14 岁亲政例主持朝政。康熙在祖母的赞许下，于同年七月七日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的亲政大典，并诏告天下。康熙名义上虽然亲政，但大权实际仍在鳌拜手中。索尼的去世，使鳌拜更加有恃无恐。苏克萨哈洞悉鳌拜的野心，但惧于他的淫威，不敢与之明斗。他用上疏请求告退的办法，将了鳌拜一军：这表明新君已长大成人，可以结束辅政局面而归政新君了。倘若皇帝允许了这一请求，其他几位大臣也势必要仿效提出辞呈，交出大权，这是鳌拜所不能甘心的。于是鳌拜先声夺人，以“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欺藐主人”的罪名，罗列了 24 条罪状，判处苏克萨哈与其子内大臣查克旦凌迟处死。康熙知道此案是鳌拜伙同他的党羽挟私陷害，不许所请。但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蛮成性的鳌拜竟攘臂上前，强要康熙批准。结果苏克萨哈等被处绞刑。

苏克萨哈既死，朝政握于鳌拜一人之手，文武各官尽出其门下，而且常常将各部院衙门官员的启奏带回家中进行商议，然后施行。官员稍有拂逆其意，轻则罢官斥革，重则囚禁诛戮，甚至对皇帝都毫无顾忌。上下官员无不汗颜心惊，如履薄冰。鳌拜的目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使皇帝成为自己的傀儡。

康熙时值少年气盛，虽欲有所作为，但慑于鳌拜的专横毒辣，说话做事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康熙亲政后，一方面不断给辅政大臣加官晋爵，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在群臣中直接树立自己的威信，屡诏臣工直陈政事得失，即使是法制不便之处，也许各抒己见，不必隐讳。秘书院学士熊赐履上疏说：“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请求皇帝能经常‘接见儒臣,讲论政治”。鳌拜知道这是针对自己的,诘问‘积习”“隐忧”所指何事，并进而要求以所陈无据、妄奏沽名之罪严加处治，并强迫康熙下诏禁止言官陈言政事。康熙不但不准其请，还奖掖言官。鳌拜的倒行逆施、无法无天，严重地侵犯了已经亲政的皇帝的权力和威信，使年轻气盛的康熙再也无法容忍。表面上，康熙和鳌拜以君臣相处，而实际上却在各自私下筹画，迫使对方屈服于自己。这就是开头那紧张的一幕所出现的背景。

康熙心里清楚，自己要想有所为，就必须除掉鳌拜！

由于鳌拜的死党遍布朝野，稍不留心，非但不能除掉鳌拜，反而会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康熙采取了欲擒故纵的办法。康熙事前不露声色，有时还有意顺着鳌拜，自己显出无所事事的样子，使其不致产生疑异，暗地里却在紧张筹画。康熙借口

喜欢摔跤游戏，从满州上三旗的弟子中挑选了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为贴身侍卫，要他们练习摔跤以侍候皇帝，实是准备擒拿鳌拜。就在席下藏刀事件发生后几天，康熙见时机成熟，便召鳌拜进宫。鳌拜走进宫门，尚未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一群少年侍卫擒拿。康熙列举鳌拜大罪三十条，将其籍没拘禁，他的党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治。

清除了鳌拜集团以后，康熙追复被鳌拜陷害的苏克萨哈、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等人原职，并赐美善的谥号 其余凡因各案牵连或以各种原因受鳌拜迫害而被降革的官员，一律平反昭雪，或官复原品，或予以升迁这些举措大得人心，朝野上下交口称赞此外，康熙在政策上也作了一系列重大调整：

严禁掠买良民为奴。四大臣辅政期间，奉差官员及督抚提镇等大小文武官员贪赃枉法，大量掠买良民为奴，甚至多买用以馈送亲友 、这种满洲落后习俗的泛滥，引起了中原人民的激愤。康熙下令：以后严禁掠买良民充奴，违者从严治罪。此举得到满、汉人民的一致拥护，尤其是汉族人民的支持。

永停圈占民间房地。圈地为清初最大弊政之一，它不仅迫使人民流离失所，而且加剧了满汉矛盾。顺治八年（1651）、十年（1653）、康熙三年（1664）屡有停圈之令。康熙五年（1666），由于鳌拜倡首，圈地之风又盛。此时，康熙果断宣布：“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清初陆续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圈地，至此方告结束。

恢复内阁和翰林院。康熙九年（1670）八月，诏命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置满汉大学士四人，另外照旧设置翰林院。

同时，康熙又整顿吏治，严肃部伍。自此，清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开始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

清除鳌拜是康熙亲政后处理的第一件国家大事，在极短时间内顺利铲除盘根错节、权倾一时的朋党，成功地将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在策略上，只处死少数首恶分子，对鳌拜党羽中的绝大多数均予宽宥，避免了广泛株连、错杀无辜。如此迅速而成功地消灭鳌拜集团，表明年仅 16 岁的康熙已经具备解决重大政治难题的政治才能。随后实施的一系列安定人心、整治吏治的措施，更显示了康熙的卓越才华及其一生中施政的某些特点。

前途虽然坎坷，困难依然重重，但已预示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第二节　平定三藩　统一台湾

顺治时，清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已基本确立。虽然各地仍有反清势力存在，但已不存在与清政府相抗衡的力量，这是问题的一方面。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又是形势绝不允许过分乐观，部分地区一直未能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即使在康熙亲政以后,南方数省仍有‘三藩’割据势力,台湾岛有郑成功家族反清武装。自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就转移到了长江流域。至明清，每年都要从江浙一带运输大量米粮接济京师乃至整个北方。因此，江浙这个经济命脉保不住，整个国家形势就不会稳定。而“三藩”和郑氏控制的反清武装则随时都有可能卡断政府的这条生命线。很显然，对康熙而言，要巩固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非要把这两颗钉子拔掉不可。在清除鳌拜之后，康熙即着手完成这两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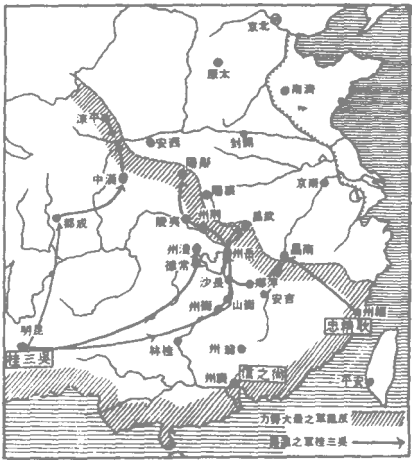
一、平定三藩,大陆统一

“三藩”是怎样形成的呢？清政府定都北京后，为了充分利用汉族降将的力量以统治控制全国，封了 四位汉王，他们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定南王孔有德。顺治六年（1649），耿仲明死于江西，其子继茂袭爵。顺治九年(1652)，孔有德死于桂林，无子继承王位。此后，清政府令吴三桂镇守云南，尚可喜镇守广西，耿继茂镇守福建，耿继茂死后，其子精忠嗣爵。这就是清初三藩的来龙去脉。清政府建三藩，并给他们以管理兵、政、财的极大权力，本为“辑宁疆圉，以宽朝廷南顾之忧”，因为全国未定，满洲人少，尚无暇顾及边远地区。然而事与愿违，三王分镇之后，手握重兵，雄踞一方，位尊权重，后竟目无朝廷，逐渐走上与中央政府对立的道路，俨然成为分裂割据的军阀势力。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康熙暗下决心：三藩势在必除，否则将国无宁日！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与长子尚之信不睦，上疏请求自带二佐领归老辽东，之信袭爵留镇。康熙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撤藩的大好时机，遂以父子宗族不宜分离为由，命令尚可喜带领所属兵丁、家口，全部撤回原籍。这一决定使吴三桂和耿精忠深为不安。七月，他们也不得不作出姿态,假意疏请撤藩，试探朝廷态度，以为皇帝绝不会批准他们的疏请，会加以慰留。康熙将计就计，马上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尽管廷臣中大多数持反对意见，康熙仍于八月初六日，毅然下令三藩并撤，命徙藩山海关外；并派员前往督行：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往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往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往福建

撤藩使到达云南，全藩震惊吴三桂弄假成真，恼恨不



三藩之乱要图

已。他阳为拜诏，暗地里准备铤而走险，与诸将密谋反叛。十一月，吴三桂惨杀巡抚朱国治，扣下折尔肯、傅达礼，自称“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挑起了三藩之乱的战火。随后，耿精忠亦据福州作乱，尚之信挟父叛清，孔有德部将孙延龄起兵广西。大半个南中国乌云滚滚，战火弥漫。

吴三桂倡乱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恐。原先反对撤藩的王公大臣索额图等惊慌失措，请诛主撤之臣以谢三桂。在这危难时刻，康熙镇定自若。他坚定地指出：“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委过于人耶？”此时康熙仅 20 岁，他不仅没有被叛臣所吓倒，相反勇敢地担起了平叛重任，迅速调兵遣将，制订了卓有成效的军事、政治、经济部署：

军事上。首先停撤闽、粤两藩，以便稳住耿、尚，集中力量对付滇、黔，诏削吴三桂官爵，揭露其叛逆之罪于天下。同时，命各路兵马坚守广西、四川、湖广，稳定西北。

政治上。实行分化瓦解政策，孤立吴三桂，将在京的三桂子孙明令正法，而宽赦耿精忠在京诸臣；重用和提拔汉人将

领,充分发挥绿营兵的作用,康熙深有体会地说:"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

经济上。江南地区是重要财源,江南诸省中尤以苏、松、嘉、湖为根本,当时有"三吴财赋,实甲海内"之说。为防范三藩及台湾郑军的攻击,康熙对此地区防守作了周密安排,以保证军需供应。为了筹措军费,康熙还采取了以下措施:(1)裁减地方经费,加强财政管理;(2)削减官俸,加征官绅田赋,鼓励官员和富民捐纳;(3)增收钱粮和盐税;(4)加征关税和杂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措施是有效的,也是无可指责的。

由于康熙临危不乱,统筹全局,调度有方,战争初期对清政府不利的形势逐渐转化。在广东,尚可喜因不愿背叛朝廷忧愤而死。吴三桂封可喜子之信为辅德亲王,促其出师,索其军饷。尚之信不愿为其卖命,遂于康熙十六年(1677)举兵降清,广东全境平定。在福建,耿精忠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派兵三路北犯。清廷屡次招安,精忠拒不接受。至康熙十五年,精忠部队屡战屡败,加之腹背受敌——台湾郑经军乘机占领福建沿海,精忠遂遣其子至清营献上总统印请降,并请随大军征剿郑经军赎罪。次年,郑经军败退厦门,闽浙告平。在广西,孙延龄叛而复悔,准备与清军里应外合。吴三桂闻孙延龄变心,急派从孙吴世琮以恢复广东为名,杀孙延龄。但形势已不可逆转。清军大兵压境,吴军迅速溃散,吴世琮身受重伤,仅率数十骑逃走。在其他地区,清军亦连战皆捷,吴三桂地盘日益缩小,势孤力单,财用耗竭,已是穷途末路。

吴三桂为了维系人心,强励士气,于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初一在衡州(今衡阳)称帝,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置百官，大封诸将，僭造新历，并举行云、贵、川、湖乡试。殿堂不及更换黄瓦，便以黄漆涂之。即位之日，风狂雨注，仅草草成礼而罢，一幅狼狈景象。

八月十七日，吴三桂在四面楚歌中忧病而卒，吴世璠继立。叛军内部困难重重，人心涣散。康熙利用这一变故，命各路清军加强进攻；同时瓦解敌军，遣人招抚。长沙、成都、重庆、岳州等要塞相继归复。

至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清军进围吴军巢穴——昆明，这是叛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清军列营把昆明围个水泄不通。十月，城中食尽援绝，南门守将启门迎降。叛将钱缄、吴国柱等谋执吴世璠以献，吴世璠闻变服毒自杀，昆明收复。

至此，历时 8 年之久，战火燃及大半个中国的三藩之乱彻底平息，全国局势得以稳定，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二、台湾重新回归大陆

郑成功因收复台湾而成为民族英雄，清入关后举行反清起义仍为人们所称颂。但是，随着南明政权的灭亡及清朝的统一进程，郑氏政权已成为一个分裂割据的象征。在这种形势下，孤悬海外的台湾有被分裂出去的可能，因而，台湾回归祖国，结束分裂局面，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康熙元年(1662)五月，郑成功在台湾病逝，驻守厦门的其子郑经袭为延平王次年，清朝派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水师提督施琅会合荷兰海船，收复厦门、金门。郑军全部退入台湾后郑军屡犯福建沿海，但始终没能在大陆立足。

郑经回台湾后，抑郁潦倒，萎靡不振。康熙十八年(1679)，年方 37 岁即委长子克塽监国，而自己却放纵于酒色

之中，不理政事，日以游嬉占卜为乐。他声称：“我远处海岛，可无忧。”由此可见，他的抗清复明目标不仅完全丧失，再无西征之意，而且麻痹大意，以为可以永远与大陆相隔离。溺于声色的郑经终于中风死去，继立的克壓虽然年幼，但聪明果断，勇敢坚毅，性格颇似祖父，很想有所作为。然而，近臣冯锡范背信弃义，发动宫廷政变，缢杀克壓，立郑经次子、年仅 12 岁的克塽为延平王。克塽幼弱不能莅事，政务皆决于冯锡范，政治愈加黑暗，人心愈加涣散。

在平定三藩之乱进入尾声时，康熙就考虑收复台湾的计划了。二十年（1681）六月，康熙得到郑经病死、台湾内乱的密报，即认定时机已经成熟。七月，他决定进剿，迅速调兵遣将，根据学士李光地、总督姚启圣的推荐，重新起用原郑成功部将施琅，委以福建水师提督并加太子少保。施琅受命后，十月即抵厦门视事，见水师纪律松懈，毫无斗志，断然采取一系列整顿措施，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

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在铜山港誓师，统水师 3 万余人，战船 300 艘，进攻澎湖。当时，驻守澎湖的是身经百战的骁将武平侯刘国轩，他率领的 2 万水师虽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十六日，两军首次交战，清军失利，施琅及先锋蓝理俱伤，大小将领 70 余人阵亡，损失惨重。二十二日，两军展开决战。施琅吸取了教训，改变战术，加之将士作战勇敢，此战大获全胜。刘国轩惨败逃回台湾，其部将官 400 余员战死，165 员投降，兵卒战死 12000 余人，降 4850 余人。

澎湖之战，郑氏军队的精锐主力基本被歼，台湾为之动摇七月，郑克塽、刘国轩上表请降。八月，施琅率军进入台

湾，台湾兵民剃发归降。

为永保台湾，清廷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在台湾正式设置行政机构。设台湾为府，下辖台湾、凤县、诸罗三县，澎湖设巡检，设台厦兵备道，兼理提督、学政、按察使司事，分统水陆，并编户籍，定赋税，通商贾，兴学校。至此，台湾正式隶属于清朝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在台湾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是康熙朝非常重要的两件大事。第一、只有在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后，国家形势才稳定了下来，中国大陆才得到了真正的统一，东南沿海及清朝的经济中心——江南才有了安全保障。第二、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吴三桂分裂西南、郑氏割据台湾是不得人心的举动。同时也表明，清朝的正统地位已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此后民间反清活动减少及人民积极支持平叛战争就是明证。第三、在这两次大规模的战争中，康熙充分显示了运筹帷幄、聪明果断的非凡政治才能。

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空前发展的时代——康乾盛世的开始，清朝统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节　重农恤商　民生乐业

如果说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前，清朝政府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用武力清除敌对势力，确保新政权的存在和稳定上；那么在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之后，便需要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政治的手段，以确保大清江山的长治久安，而最首当其冲的就是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使百姓安居乐业的问题。

纵观康熙朝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措施，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拓展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

明末清初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乱，以及其他各种天灾人祸，造成了大批人口死亡流散和成片田地的荒芜，这不仅威胁着清政府的稳固，也给新政权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因此，自顺治初年，清政府就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垦荒，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康熙亲政后，继承并发展了顺治时期的垦荒政策，政府财政收入从根本上得到了好转。

鉴于“催科太急”的情况，康熙十年(1671)，清廷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放宽起科年限，下令新垦荒地四年起科（即垦荒耕种后的第四年上交税粮），第二年宽限到 6 年，及至康熙十二年(1673)又放松为 10 年。随着战争的停息，政府贷给垦荒农民的‘牛种银’亦大大增多。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各省、府、州、县都专门拨牛种银招徕各地农民垦荒。清廷还特别注意对各级官员的“劝垦”考成，奖励地方乡绅垦荒，此外还制定了严格的审核制度，凡捏报谎报垦田亩数者，要受到严惩。在上自皇帝下至臣僚的倡导下，康熙朝垦荒成绩卓有成效。

据雍正二年(1724)的统计，当时全国账籍上记载的垦田数字已达 6,837,914 顷，比顺治末增加了 134 万顷。此外，加上不入账籍的垦田数字，其垦荒总数肯定比这要多得多。通过垦荒，很多衣食无着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变成了自耕农。流民减少，亦使社会大大稳定。随之而来的是，户部的库存银也每年增加。据奏报：康熙六年（1667）存银 248 万两，九年(1670)近 700 余万两，至十二年（1673）达 2135 万两。这表明

政府的财政状况完全改变了顺治年间入不敷出的局面，康熙正是凭借这种经济力量的支持，才敢毅然下令撤藩的。即使在 8 年的平藩战争中，库银仍时有存余，如康熙十六年（1677）存银 530 余万两，十七年(1678)存银 330 余万两。三藩战争结束后，户部积存银数更激剧地增长，康熙二十五年(1686)已存银达 2600 余万两。自康熙三十一年（1692）到六十一年(1722)的 31 年中，户部每年的库存银都在 3000—4000 万之间,最高时达 4376 万余两。户部库存银的增加，表明了清朝政府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历史上所谓的“康熙之治”，正是建立在此物质基础上的。

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康熙初年，清政府主要依据顺治时《赋役全书》所规定的项目征收田赋。为杜绝官员营私舞弊，乱向百姓摊派，康熙三十年(1691),诏令将《赋役全书》科则、输纳数目,在衙门外勒石刊示。从此以后，政府赋役数额大体上被固定了下来，不得任意改动。这对抑制私派滥派、减轻纳税户负担，有一定积极作用。

那么，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自明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起，即把一部分丁银挪向地亩征派，出现了赋役合并、役归于地的倾向。但丁银并未取消，而且数额仍相当可观，直至清初仍是政府的主要财政之一。为了逃避沉重的丁银负担，豪强地主往往与官府相勾结，将之转嫁到一般农民身上。为了生存，贫苦农民只好以逃亡来表示对丁银负担沉重不堪的抗议。地方官向上交不了帐，就用“包赔”的办法进行搜刮，即将逃亡的人丁银转嫁现有的人丁身上。这无异于饮鸩止渴，竭泽而渔。

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制定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办法。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人丁 2462 万，丁银 335 万余两）作为每年征收丁银的根据，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永不加赋”把丁税负担的总额固定下来，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它堵塞了官府以丁税的名目向百姓无限制地加重剥削的途径。但是，它并没有解决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地主豪绅与官府相互勾结，营私舞弊，使丁税负担大部分落在贫苦农民身上。因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在防止农民逃亡和稳定丁银征收上，仍不够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摊丁入亩”制度应运而生。所谓“摊丁入亩”(也称“摊丁入地”、“地丁合一”、“丁随地起”)，是指废除单独征收人口税，将原来征收的丁银全部摊入土地税内按亩合并征收。具体实施办法是，以府或县为单位，把康熙五十年(1711)应征的丁银总额，不分贫富贵贱，一律分摊到田赋中去。

摊丁入亩这一制度的实行，使人口税在中国历史上绝迹了，说明国家对人民的人身控制逐渐减弱，对农民是一件有益的事。另外，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事实上，农民土地少，官僚地主土地多，丁税摊入地税之中后，原来贫苦农民负担的份额实际上分摊到地主身上。 因此，这一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而遭到官僚地主的反对。

三、修治水利，造福人民

农业与水利息息相关，农业发展离不开水利建设；同时，水利建设更关系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康熙朝对修治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